第二十章 粒粒皆辛苦

Jwlu

包产到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种了九亩多田，还养了一头耕牛。鲁强十一二岁，读初中，每天放学回家要去放牛。每年双抢 (抢收抢插)，只要把早稻收完，我就和二哥去别人家犁田扮禾，抽水抓收入。九亩多田晚稻全是黄慧君去完成插秧任务。她还要晒谷喂猪。不过鲁强鲁盛兄弟也得去帮着扯秧。他们兄弟以后上高中上大学了，每年放暑假回家还是坚持帮家里搞双抢。我的母亲七十多岁了帮着做饭洗衣服。一家人从早到晚劳作，虽然辛苦，看着两个孩子读书勤奋上进，充满着欢乐的气氛。

* * * * *

我的二哥承烈是个很能干的人，为人最是忠厚，在农村里样样农活算得上里手。解放初十四五岁的他就上门替人家做零工。家里几亩田也一直是以他为主。

六十年代过苦日子那段时间，社员的口粮是发米。大队上加工大米却一直是他干。阶级不好，只要一来运动就把他换下来。可是连换几个人，这些人当中有党员、有干部，但他们每个人都完不成每百斤稻谷加工后应交的大米数量。结果，还是把他从生产队调到大队去做米。我们家是地主阶级，女孩子谁也不愿嫁到过来做媳妇，他一直没有找好对象结婚。我们兄弟没有分家，经济上不分你我，住在一起和睦相处，凡事相互忍让。

包产到户以后除了种田，农闲时我们两兄弟一起沿门做手艺。那时候农村刚刚生活好转，很多人家都建房子。当时木材稀缺，用钢筋水泥代替。我们就专门替他们预制那些水泥建筑材料。两兄弟不论种田和做工的收入都是放在一起用。后来，他外出打工挣来的钱也是不停地支援两个侄儿读书。

* * * * *

改革开放开始那两年农民的生活确实提高了一大步，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还稍微有些余钱剩米。可是，以后各种上缴和税费逐年增多。摊派的项目多达十几种。本来中央的政策规定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和提留不得超过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五，但县、乡、村三级有些干部为了贪功图升迁，有些干部贪污腐化，故意虚报农民收入，从中多收取提款，这样普遍超过了中央的规定。有的地方上交甚至达到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十几。农民劳作一年的收入往往只能解决衣食问题。遇上家里有读书的，要建房子的，生病住院以及婚丧等大事非得出外打工寻些副业收入不可。

我除了种田，先后有几年间断地到县侨联办的塑料厂做过采购员，到长沙钢厂搞基建，到长沙铭园小区搞收发等等。我出去打工的时候，黄慧君一个人在家里种着七亩多田，还喂着几头猪，累得她又黑又瘦。别人称赞她手脚麻利，做起事来象猴子一样。我在家里也不放过任何挣钱的机会。九一年秋季干旱，双抢期间，四十度的高温天气，我给人家抽水抗旱，连续七天七夜都是在田里河边度过的，累得我硬是脱了一层皮。平时谁要是请我抽水，那怕只挣得一两元钱，我都会用土车子推着两百多斤重的抽水机去干。我们俩人都在家时，种田外总是保持栏里四头猪。我们生活方面只要吃饱肚子就行，穿最便宜的衣服和最便宜的鞋子。我们一心攒钱培养孩子读书。生活难苦，劳动繁重，我们却过得蛮愉快，因为心里充满了希望。

* * * * *

九五年九月，我高高兴兴地送鲁盛到湖南商学院去读书。在办入学手续时，鲁盛还获得了三百八十元的奖学金。但这一年恰逢大学改革,大学毕业由以前的包分配改为自己择业。学费方面由以前的每年三百元一下提高到两千五百元，每月生活费还需要三百元，读本科四年仅是学费一项就得一万元。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多么沉重的经济负担。不过想来比读那个委培生的负担还是要轻得多。

幸而鲁强九三年已经大学本科毕业，在读硕士研究生,基本上不要家里负担多少了。当时，我表妹家在邵东做生意，经济上比较宽裕，她见我负担重，便写信要我到她家去一趟。九六年春节我去了她家。她说：“表哥在农村要负担孩子读大学不容易。我这几年赚了些钱，你需要多少拿多少吧。以后他们毕业了赚了钱再还我就是。”我说：“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关心，我暂时还勉强支持得下，万一实在不行我再来找你。”其实当时我手里并没有什么钱，靠种那几亩田和养猪，加上农闲打些零工，心里想的是尽量做到不欠账。她见我不愿借钱，几个表兄弟姐妹凑起来一共送给我七百元钱。这个人情如今我还时刻记在心里，那时主动借钱支援我的只有她。